



冷静看清局势，积极保持交流 —— 首届“中美加关系”论坛会议综述

中国、美国、加拿大因为近两年来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三边关系都受到了冲击。不过，越是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与问题重重的关系下，冷静的观察与积极的沟通就变得越是必要。鉴于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加拿大研究中心于2021年4月21日举行了首届中美加关系线上论坛，主题为：双边和多边维度的挑战与机遇，旨在讨论三国在双边和多边维度的问题、挑战以及合作机遇。本届论坛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中国澳门、加拿大和美国的知名学者参与，包括：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obert S. Ross（陆伯彬）；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Paul Evans（包义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钱皓。论坛还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洁勉教授担任评论人。广外加拿大中心主任唐小松教授主持了论坛。几位学者都是研究中美关系、中加关系的顶级专家，围绕双边、三边以及多边关系展开了精彩的研讨，为当前复杂的局势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考。

Robert Ross教授认为，美中关系将为加中关系奠定基础。他表达了一个非常有趣且真实的观点：美国人认为加拿大人爱美国，但事实是，加拿大人四年来都不爱美国。不管你喜不喜欢，作为超级大国的邻居总是很困难的。同时，他表示拜登的

对华政策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比特朗普还要强硬，比如在对台军售、与日本的防务合作以及对华技术战方面，而且美国正在加大与盟国的技术合作力度，美国正试图在世界各地建立一个联盟来遏制中国，也希望加拿大、欧洲国家都加入。Robert Ross教授指出，拜登相信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将创造更多成功。但他也提醒说，对中国更强硬的政策势必会导致更强硬的报复，即：如果你把中国当成敌人，他们也会把你当成敌人。而且拜登本身在国内仍然有很多议题需要解决：警察系统改革，投票权法案，移民问题等。而且他认为，在美国依赖的联盟战略中，欧洲不会在贸易政策上与美国合作，加拿大也不会。

王建伟教授赞同Robert Ross教授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价，他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路径。其对华政策比特朗普更加强硬，目前华盛顿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属于零和博弈。拜登政府几乎在中美关系的每一个层面采取了对抗性路径，包括南海、台湾。但他同时也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还体现出部分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视野，这是与特朗普很不同的地方，例如拜登政府同意回到多边主义，回到国际制度。王教授指出，拜登的对华政策及其全球政策存在一种错配。对特朗普来说，其全球政策与对华政策是一致的。他不关心人权民主，以及气候变化等，但拜登则必须与中国合作。因此，拜登政府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如何调和自由主义世界政策与强硬的中国政策。关于中美合作，王教授也提出一个问题，即：克里表示与中国的气候合作不会导致在其他层面的妥协，那么，中国的理性决策者与美国合作的动力何在？谈到结盟战略时，王教授认为，美国利用其盟友与中国打交道。在这方面，美国过度依赖这一战略可能不会产生太大效果。在目前的战略下，华盛顿似乎要求其盟友选边站队，这倒是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并非所有美国盟友都愿意跟美国走，华盛顿强力施压的方式不太可能导致盟友都让步。对中加关系而言，美中关系维持更多合作才是好消息。当中美关系改善的时候，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往往也会改善。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过分强调与中国的竞争是有害的。紧张关系的加剧会导致重大国际冲突。拜登使用“极端竞争”一词，这可能导致极端后果，这可能导致拜登强调要避免的新冷战。

Paul Evans教授对目前的局势表示比较悲观，他将其比喻为“更黑暗的夜晚”，即一个类似冷战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大家没有办法寻求双赢，而是只能尽量“避免双输”。他指出，中等国家不只是仅拥有中等的实力，而且是容易被忽略的灰色地带，正如目前，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国家被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是很困难的。Paul Evans引用了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的观点，即中国应该与加拿大打交道，其中一个原因是加拿大离美国很近。其次，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美国。加拿大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与美国不同，而这种秩序观可以允许中国的融入。他表示，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因素影响，加拿大在制定政策时毫无疑问会紧盯美国。现在的考量似乎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否可能会被称为“特朗普第二任期”。针对目前困难且复杂的三边关系的情况，Paul Evans教授提出，现在需要更温暖的应对方式来保持联系和合作。同样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作为中等强国，加拿大可以设法协助共存、合作和调解。Paul Evans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人员交往活动、大学间的交往将变得尤为重要，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温和的战略竞争比激烈的战略竞争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空间。

钱皓教授针对中加关系提出了一种“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的方式，并引用了历史上中、加两国的典型的成功案例，包括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边界冲突，以及加拿大圣劳伦斯总理在1954年3月提出的相关概念。她认为，历史告诉我们，理性的加拿大和中国可以在两国意见相左时实行“权宜之计”。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钱老师认为，双方应保持对话开放，当坐下来就事论事地谈判时，保持妥协。双边谈判可以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始，加拿大-欧盟-中国等三边机制可能会有所帮助，甚至像CPTPP这样的多边层面也是如此。钱皓教授也赞同Evans教授所说，我们应该增加学者和学生层面的互动，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增加互动。虽然加中关系恶化，但双边贸易额在2020年的前两个月也依然保持了增长，后来是主要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一案例表明，中加贸易关系不会完全受到双边关系恶化的影响。钱教授最后总结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通过谈判、妥协、个案合作，我们可以更独立，对话也可以更有成效。当各方试图对这种僵局做出回应时，就应该采取权宜之计。无论是超级大国还是中等强国，都正如中国哲学家所

强调的那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对于四位学者的精彩发言，杨洁勉教授也给出了同样精彩的点评及观点。杨教授指出，我们看到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变化。中美关系有了新发展。人们确实一度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更加理性和专业。然而，通过这次的讨论，大家似乎比四个月前显得更加悲观。事情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朝好的方向发展。美国不仅对中国更加强硬，也更迅速、更坚定地团结盟友，瞄准中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杨教授强调，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回击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中国的前进有多艰难，中国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无意发动新冷战，也不想取代美国。那种将中国的国内思维和治理与中国的全球雄心混为一谈，即认为中国要输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模式的想法是错误的。至于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杨教授认为，仅靠拜登政府团队中的三个人的态度不足以做出最终判断，也不足以决定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应该注重实际行动。杨教授指出，研究中美加关系不能光看单一国家本身。我们应该看双边、三边和多边国际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良好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符合加拿大的利益。反之亦然，如果中美关系不好，加拿大也会受到影响。今天的中等大国在稳定大国关系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中国和美国，还有欧洲和俄罗斯。中等大国善于调停、对话、维护和平，恪守妥协精神。这是当今世界真正需要的。最后对于中加关系，杨教授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定义中加关系的新时代。我们关系改善的空间于各个方面都在关闭。但我们不能脱钩，相互依存是长期趋势，要对抗这一趋势将是非常不可能的。

几位学者的真知灼见为复杂的中—加—美关系指明了问题与方向。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会比特朗普更温和，中美两国将在科技、南海、台湾、人权等多个领域出现更为激烈的竞争与分歧，联盟战略也将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如何与两个竞争中的大国相处的确是需要更多的智慧，以避免中等国家的弱势，发挥中等国家的强项。正如学者们所呼吁的，越是在这样悲观的局面下，越是应该更加冷静、理性地保持沟通与交流，减少误判。

智库观点荟萃

史汀生中心：中国是否试图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中伊签署了一项为期 25 年的“战略合作协议”。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正式联盟？这是中国在中东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表现吗？简单回答，这只是中美之间持续战略对抗的案例之一。北京认为它可以利用与德黑兰的新协议向华盛顿传达信息：今天的北京愿意忽略美国的任何制裁威胁。在经历了特朗普的强硬政策之后，北京认为自己可以抵御拜登的进一步猛攻。通过与伊朗达成协议，北京克服了美国的压力，破坏了美国的政策，巩固了中国作为非西方集团领导人的信誉，其目的是中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正在扩大其在整个中东的影响力，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问题。中国是唯一拥有明确且连贯战略的大国。相比之下，美国的中东政策看起来混乱且充满矛盾。美国将力量转移到东亚制衡中国，但是它在西亚对抗中国的能力却很小。

<https://www.stimson.org/2021/is-china-trying-to-usurp-the-uss-role-in-the-middle-east-no-but-its-complicated/>

兰德公司：美日首脑会议与韩国合作

日韩之间的紧张局势是“基石与关键”（美国分别形容日韩所用表达）联系的复杂因素。仅凭时间流逝并不能加强韩国与日本的联系。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改善日韩关系。如果美国退缩或让其他国家带头，那些反对华盛顿议程的国家可能会趁机追求自己的目标。美国希望韩国和日本建立面向未来的，基于价值观的关系，以应对诸如中国和朝鲜所构成的威胁。拜登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日本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年内部署“基础军事反击能力”，这可能会引起韩国的担忧。华盛顿需

要与日本就此类武器进行协调。其次，首尔表示将“积极考虑”于2021年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对韩美同时加入将有所帮助。最后，美、日、韩，以及澳、加、欧、印、英等大多数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先进的关键和新兴技术的主要参与者，将定义与中国权力竞争的未来。努力增加一致性并确保相辅相成，提供高质量、全球标准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以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华为5G技术可能是美国帮助推进“美日韩三方合作”的方式。拜登政府的目标是更新日本-韩国-美国的合作方式，但也存在着巨大的民意障碍。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4/the-japan-us-summit-and-cooperation-with-south-korea.html>

布鲁金斯：《美墨加协议》（USMCA） 对拜登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拜登明确表示，贸易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同时他会将重点放在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以及通过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来扩大机会上。对美国来说，在这方面没有比USMCA更重要的区域贸易协定了。而且拜登政府已经表示，其首要任务之一将是加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传统盟友的外交关系。尽早明确承诺加强这三个北美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将是一个受欢迎的信号，表明拜登政府将优先考虑联盟外交。

USMCA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23%的出口产品销往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只占5%），墨西哥超过7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和加拿大，加拿大62%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和墨西哥。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为区域供应链的附加值提供了关键投入（美国的附加值为40%，中国为5%）。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与中国竞争暴露出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有弹性的供应链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拜登政府下令对美国的供应链进行审查，目的是减少美

国对中国生产的关键投入的依赖。北美一体化的供应链可以为中国制造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并允许一些关键行业将生产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1/04/28/the-importance-of-usmca-for-the-biden-administrations-economic-and-foreign-policy/>

国会研究服务局：美国会重点关注中国半导体行业政策

报告指出，针对中国新的半导体行业政策，国会应当考虑：（1）如果国会决定增加联邦政府对半导体的投资，包括研发和运营，是否需要在任何广泛或具体的资金支出中加入额外的条件和保护。这些规定需要考虑从最初研究阶段到商业化整个技术生命周期中国获取专门知识的任何潜在接触点；（2）国会可能会考虑评估中国瞄准美国的研发能力和开源技术是否值得政府对美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额外的监督和控制，以及美国工业界在开源技术平台上与中国分享的技术专长；（3）美国国会可能会探讨是否需要对美国半导体设备、工具和软件的出口加以附加条件或控制，这些设备、工具和软件在提高中国的制造能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4）国会可能会考虑是否需要制定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或安排。美国国会可能会考虑，是否鼓励拜登政府加快与日本和欧盟的合作，制定新的多边规则，以对抗中国的国家补贴和其它令人担忧的做法。美国国会可能会考虑是否要求政府在研发和出口控制方面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联合行动和协作，以此作为提高美国关键供应链弹性努力的一部分。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4231.html

主编：唐小松

编辑：刘丹

电话/传真：+86-20-86318925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邮箱地址：gbqy2021@163.com

校对：郑文英

邮编：510420

网站地址：<https://gbqy.gdufs.edu.cn/>